

改善民生：邓小平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价值维度

单孝虹

2011-10-21 16:39:58

单孝虹

摘要：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和政治家的睿智，把改善民生作为思考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政权、巩固政权的执政伦理的重大价值维度。他认为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是党治国理政的价值目标，发展生产、改善民生、造福人民是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是执政主体基本的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关键词：邓小平；改善民生；执政伦理；价值维度

作者简介：单孝虹，1969年5月生，哲学硕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多种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主持完成省部级和国家课题多项。

执政伦理是政党这个主体在执政实践中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总和。作为取得了执政地位、掌管国家权力机构的执政党，有其共同的纲领和价值目标，通过意识形态、路线政策、执政绩效、组织架构、公众形象及道德示范等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地位。为赢得执政地位的道德认同与支持，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就必须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作为执政责任，形成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核心的执政伦理取向，具体又通过执政主体的理想和行为表现出来，反映在执政主体在执政活动中的品格、态度和作风等执政主体上面。执政伦理不仅由党章党纪明文规定，而且需要靠执政党的理想信念、品格作风等形成和维持其政治性、先进性和示范性，从而使执政伦理渗透在党的执政实践中，成为党执政的精神动力。

在现代中国，民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正是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改善和解决民生赢得民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继续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开启了新中国治国理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富民之路。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和政治家的睿智，汲取中华民族传统为政伦理的精华，在继承毛泽东执政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一直把改善民生作为思考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政权、巩固政权的执政伦理的重大价值维度。他把改善民生作为党治国理政的价值目标，作为获得人民拥护与支持的基本前提；把发展生产、改善民生、造福人民作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作为执政主体德性的基本要求，作为思考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视角。

一、改善民生是取得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基础

邓小平历来重视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一直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党的重大政治问题，作为赢得民心，推动民主，获得政权的执政伦理的价值维度。抗战时期，邓小平在领导创建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于取得政治及军事胜利的重要性，指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是调动根据地人民积极支持战争，赢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障。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正如毛泽东在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搞好“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才能“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1】1937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涉及到具体的民生问题的就有3条：“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七、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

减息、救济失业。赈济灾荒。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2】

1938年1月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为调动人民抗战热情，他非常重视做好动员新兵的政治工作，同时更不忘记关心新兵及其家属的生活困难，体现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仁义之师的风范，与国民党军队“抓壮丁”使群众抵抗和反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告诫部队的干部和老兵要“注意新战士的伙食及衣物的供给，尽可能减少新战士的困难与苦痛，使新战士的精神感到愉快”【3】，同时要请当地政府和群众团体帮助解决新兵家属的生活困难。

1938年7月16日，卡尔逊到八路军开创的晋冀鲁豫采访，卡尔逊很想知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邓小平向他非常流利地列举了十大纲领，卡尔逊非常佩服邓小平超人的记忆力，在他的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双星》这本书里叙述了这件事，这是西方人撰写的首次介绍邓小平的书籍，它向世界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即使是在非常艰难的战争岁月也不忘践行党的宗旨，把改善民生作为聚民力、凝民智的基础，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最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1942年9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194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在整个抗战时期，邓小平领导创建了太行、太岳、冀南等抗日根据地，他多次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于取得政治及军事胜利的重要性，指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是调动根据地人民积极支持战争，赢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障。

从1942年夏开始至1943年，抗日根据地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水灾、旱灾和蝗灾，同时敌人又对根据地频繁进行“扫荡”和残酷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的斗争形势相当严峻，中共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广泛的大生产运动。1943年9月21日，邓小平主持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129师师部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他在会上作《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讲话，指出军队和机关要加强团结，“自己动手解决部队及机关的生产问题，减轻人民负担”【4】。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以及根据地的“战争、生产、教育”三大任务，邓小平提出围绕保障战争的胜利这个中心，一切“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5】，即使在敌占区和游击区也不能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必须照顾那里的环境，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6】。他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必须要综合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力量，因为如果“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除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7】。

基本的民主权利也是抗战时期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诉求，邓小平非常关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他说：“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8】在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中，要坚持我党对政权的领导，必须“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9】。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才是廉洁民主的、改善民生的、真正抗日的政府，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的抗日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进步的法律，打击敌对势力破坏抗日、损害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保护人民群众从事各种合法活动，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民众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都得以保障，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协调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以改善民生、推动民主，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绝对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十分重视大别山等根据地的民生建设，1948年4月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和今后的政策策略》一文中对战争问题、土改问题、整党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等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10】邓小平总结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说：“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够得到胜利呢？首先，当然由于我们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是，仅仅有正确的主张还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取得胜利。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结了起来。”【11】

二、改善民生是巩固政权的治国理政的价值维度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任务更伟大更艰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果我们不能尽可能迅速地把国家建设搞好，不能“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要失败”【12】。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邓小平作为其中的重要成员，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善于实事求是思考中国自己的问题。

1949年11月23日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12月2日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2月22日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在领导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中，邓小平认识到党的工作中心已转移到生产建设上，对改善民生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有非常充分的认识。5月16日，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西南区当时的中心任务除了剿匪和征粮而外就是领导生产和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解决好这些任务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13】。6月6日，他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做报告告诫同志们，为了完成好这些任务必须注意工作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

态度，正确执行政策。他说：“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是非常错误的。”【14】在总结城市初期的接管工作时，他主张要按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指示去做，要特别做好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工作，要“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15】，对待资产阶级我们应该“又团结又斗争”，根据当时的情况执行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否则“就会形成大批的关厂停业，于工人阶级、于国计民生都极不利”【16】。

1952年党和人民政府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的任务，从1953年开始党和人民政府启动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1956年全面地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9月15日到27召开的党的八大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7】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而这也是提高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必要条件。”【18】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认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面临严峻的治国理政的挑战，“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19】。

可惜党的八大这些可贵的思想没有继续得以贯彻实施，1957年以后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出现很多失误，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胡夸风等，以及非常严重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总结教训时指出：“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20】这次会议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征程，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进行了拨乱反正，全党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为“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很多”【21】，“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22】。在面对我们党的执政伦理遭遇的考验，邓小平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23】“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更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弊端相关，“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4】。

邓小平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能力，是党赢得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的基本执政伦理要求。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的改善上。”【25】“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6】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27】“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28】。他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醒全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29】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以及对政治权利的诉求也不断增强，所以在邓小平看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与法治建设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质量，更关乎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早在1979年6月28日，邓小平就提出：“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30】1982年4月4日，他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明确强调：“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31】后来邓小平又多次强调“两手抓”而且还要“两手硬”。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告诫全党：“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2】这是邓小平关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验教训的总结，他对精神文明建设、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重视体现了他对中国民生事业的深切关怀，如果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搞好，党缺少民主执政的伦理精神，那么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又会像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遭到践踏，就不可能维持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人民生活得不到真正的改善，这样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巩固和发展。

三、改善民生是执政主体的基本执政伦理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道德修养，追求“明明德”，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内圣”的功夫，是个体道德；“修身”以后，要追求“外王”的功效，实现国家政治的社会伦理要求。“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人格生长逻辑意义上的伦理政治之道。个体道德是社会伦理和国家政治的前提，道德人格是政治人格和政治伦理

实现的。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3】毛泽东曾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34】邓小平认为党的基本路线确定后要由德性修养好的执政主体来执行，并且通过制度来保证。他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5】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需要执政主体信仰坚定，人格高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高。

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对我们党执政后对政治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警告，他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表现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所以，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我们的广大党员就应该不断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一方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历来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非常重视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同时也一再强调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要求，可见他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视。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不断改善民生也成了邓小平对执政主体提出的基本德性要求。他明确指出：“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36】

针对改革开放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37】而克服不正之风打击犯罪固然要靠我们的民主与法制保障，执政伦理也同样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只要我们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做人民公仆，只要领导者大公无私，以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做好改善民生的工作，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从而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38】要做好改善民生这件大事，邓小平认为需要我们执政主体“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及其他的工作态度”【39】。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某些不实心实意关心人民群众生活，搞所谓的政绩工程的领导干部，邓小平进行了严肃地批评，他指出，必须制止“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杜绝“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40】。他要求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领导就是服务”【41】的观念，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不搞特殊化，“现在，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42】。群众为什么会在这几个问题有意见？为什么战争时期“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43】。只要“我们切实关心群众生活”，“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克服”【44】。

四、改善民生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价值判断标准

基于对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的探索实践，从1980年开始直到1991年，邓小平近20次提出要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指出搞清楚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并且分析了我们没有搞清楚的原因，指出了搞不清楚的后果。在这个思考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把改善民生作为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非常重大问题的重要视角，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并列为“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考量我们的执政能力，来评估我们党执政伦理的善恶。

从改善民生的视角看来，为什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呢？

首先，邓小平分析了 we 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改善民生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80年4月12日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45】1984年6月30日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46】1985年4月15日，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47】

其次，邓小平分析了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民生建设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他认为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教训之一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48】这样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吸引力和优越性呢？也就是说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做好，那么我们党执政伦理将遭遇非常严峻的挑战，治理没有达到善治的基

本要求的话，不能获得民心，不能赢得基本的执政支持，基本的执政资源将会流失，最突出的就是执政的意识形态资源将直接面临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危机。对这个问题，邓小平看得非常透彻，早在1980年11月6日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代表团时就坦然说道：“社会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是穷社会主义，总不能说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是好东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要使国家富强起来。”【49】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直以“我是人民的儿子”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挚情怀，把提高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他的毕生追求，把改善民生作为他思考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维度。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通过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并且不断探索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之路。这条道路既呼应了最广大人民之所需，也顺应了世界发展之趋，从而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也巩固了党执政伦理的基本意识形态资源。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0.
[2]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99-330.
[3][5][6][7][8][9][10][11][13][14][15][16][19][3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85,41,65,8,9,103,236,149,157.175,180,217,157.
[4]邓小平年谱（一九零四—一九七四）：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90.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
[17]邓小平年谱（一九零四—一九七四）：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312.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16.
[20][21][23][24][25][30][31][36][40][42][43][44][4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3,245,329,333,128,189,404,151,100,216,217,228,312.
[3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2.
[3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22][26][27][28][29][32][35][37][38][41][46][47][4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9,213,354,371,370-371,378,380,164,144,121,63,115-116,134.
[4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688.

责任编辑：张广照 孔建会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9845